

# 王安石熙寧教育變革的近代解讀 ——以梁啟超的《王荊公》切入

桑亞珍

## 摘要

20 世紀初，梁啟超的《王荊公》一書將王安石帶入了眾人視野，隨即吸引眾多海內外學者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成果頗豐。然而，相對於新法改革的諸多成果，教育改革仍有很大空間有待發掘。又因梁、王兩位改革家在教育改革上，如「廢科舉」、「興學校」、培養「經世致用之才」等方面有着共通之處，故筆者以《王荊公》為切入點，對王安石在熙寧年間的教育變革，進行各方面的宏觀分析，以此找出對現代教育改革可以借鑒的關鍵點。

## 關鍵詞

梁啟超      《王荊公》      王安石      《三經新義》      教育改革

## 一、前言

科舉制度自唐開始，在宋朝逐漸發展成熟，至清朝末年（1905）廢止。20 世紀初，西學新思想湧入，科舉制度亟待廢除，戰事不斷，時局不穩，知識分子紛紛為救國呼籲新法變革。在這樣的背景下，梁啟超（1873-1929）的《王荊公》<sup>1</sup>一書為王安石（1021-1086）徹底翻案，立刻在學界引起了轟動，並吸引了大量海內外學者開始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各個方面，且相關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時至今日，成果頗豐。大陸學者的論著學說，多集中在王安石變法研究或政治改革方面，少有篇章提及貢舉教育改革，例如柯敦伯的〈王安石〉等 90 多篇文章；也有將王氏新法編入國史著作，如錢穆（1895-1990）《國史大

<sup>1</sup> 1908 年由上海廣智書局印行，收入《中國六大政治家》第 5 篇，後輯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27。

綱》第六編第三十二章的〈熙寧變法〉；後期著作如漆俠的《王安石變法》，蔡尚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期刊論文如王曾瑜〈王安石變法簡論〉，顧全芳〈評王安石變法〉，朱瑞熙〈王安石《字說》鉤沉〉等。<sup>2</sup>20世紀後半葉，臺灣學者開始關注研究王安石及其變法，以傳統的治史方法為主，半個世紀間臺灣地區發表有關論文多達二百多篇，研究方向集中在史學新法或政治黨政方向上；日本研究者如荒木敏一、近藤一成等，研究亦集中在王安石哲學思想、新法變革、「性情命論」等方面。<sup>3</sup>此外，歐美學者對王安石的研究已有近三百年的歷史，自18世紀，杜赫德（Du Halde, 1674-1743）在巴黎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開始，到馮秉正（De Mailla, 1669-1748）著譯《中國通史》第8卷，王安石以變法的負面形象出現。20世紀上半葉之後，西方學者對王安石的關注增多，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Hartwell, 1932-1996）的一系列論著，闡述了他對王安石的看法和研究，具有里程碑式意義。還有韓明士（Robert Hymes）、史樂民（Paul J. Smith）等人，研究集中在政治變法革新方向、教育思想、社會主義經濟學等諸多方面。<sup>4</sup>

清末，梁啟超面臨着和王安石熙寧變法時候的同樣問題：科學制度是否該被廢除？學校培養人才的方式是否可以廣泛推廣最終取代科舉？梁啟超在《王荊公》一書中針對王安石變革的策略，言語之間盡顯欣賞之情。由《王荊公年譜考略》可知，千百年以來，王安石多遭到質疑和貶低，肯定及贊成之聲屈指可數，<sup>5</sup>所以《王荊公》一書又被梁稱為「洗冤錄」。從梁啟超所從事的教育改革來看，兩人的教育思想又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故筆者選取王安石教育改革這一方向，以梁啟超的《王荊公》作為引入點，通過客觀分析梁啟超眼中的荊公形象，以及梁的教育改革人才觀思想，並聯繫王安石教育變法的具體情況，這也是本文的創新之處。

## 二、梁啟超與《王荊公》

### （一）梁啟超簡介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梁自幼聰敏，青少年時期接受傳統儒家教育，且不管是童子試還是鄉試，皆榜上有名。據其自傳《三十自述》可查，1890年，梁啟超18歲進京會試，試第結束路過上海買書，對世界有了宏觀認識。<sup>6</sup>後學習西方先進思想，遊歷歐美日等國家，開闊眼界，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世界，後結識南海先生康有為（1858-1927），對其學識及人格崇敬不已，

<sup>2</sup> 朱瑞熙：〈20世紀中國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頁151-165。

<sup>3</sup> 詳參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501-517。

<sup>4</sup> 張呈忠：〈近三百年來西方學者眼中的王安石〉，《史學理論研究》2016年第4期，頁133-141。

<sup>5</sup> （清）蔡上翔：〈王荊國文公年譜考略序〉，載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3。

<sup>6</sup> 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11，頁15。

從於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長達三年，此間「（康）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sup>7</sup>這段時期是梁啟超接觸西學並改變思想的關鍵時期，而且康的教學方法對梁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二）梁啟超的人才觀

### 1. 政治人才時期

1896年，梁啟超致函張之洞（1837-1909），建議書院課程科目採用西學，強調「惟政治學院一門，於中國最為可行，而於今日為最有用」。<sup>8</sup>梁還列舉中國歷代名士的教育思想，認為從秦漢兩朝，到「後周之王朴，宋之荊公」<sup>9</sup>等人，都十分看重政法之學以安國。

1897年，在杭州知府林啟（1839-1900）改善慈寺為求是書院之時，梁啟超專門寫書信提出自己對興辦學堂的想法：面對西學熱潮，梁啟超以「政學之用較廣，藝學之用較狹」的理由堅持政學為主、藝學為輔。<sup>10</sup>他認為當時學習西學雖為時局所需，但中學也不能拋棄，尤其是六經諸子，不可荒廢，否則大興學校所培養出來的人才「雖糜巨萬之經費，只為洋人廣蓄買辦之才；十餘年後，必有達識之士以學堂為詬病」。<sup>11</sup>

1897年，當湖南興辦時務學堂時，梁啟超作為維新派的積極人物，來到湖南指導學習，並寫下《湖南時務學堂素質教育方案》，共計十條建議：「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和傳教」，前八條是學校日常功課，後兩條則揭示了學校最終培養的人才——經世傳教、學以致用的政治型人才。<sup>12</sup>對當時的梁啟超來說，以儒學為主摻雜西學，是培養政治人才最合理的方式。

### 2. 國民教育時期

第二個時期即國民教育時期，梁啟超曾道：「一國之有公教育也，所以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之結為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優勝劣敗之場也」，<sup>13</sup>而「教育之意義，在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結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列國之間，不徒為一人之才與智云也。」<sup>14</sup>

梁啟超逃亡日本十餘年，對日本的教育體制深有感觸。從小學到大學，再對比當時中國對小學教育的忽視，所以他在〈教育次序議第一〉中說，「求學譬如登樓，不經初級，而欲飛升絕頂，未有不中途挫跌者」，<sup>15</sup>用形象的比喻說明小學基礎教育的重要作用，認

<sup>7</sup> 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卷11，頁16-17。

<sup>8</sup> 梁啟超：〈上南皮張尚書書〉，《飲冰室合集·文集》，卷1，頁105。

<sup>9</sup> 梁啟超：〈上南皮張尚書書〉，《飲冰室合集·文集》，卷1，頁105。

<sup>10</sup> 梁啟超：〈與林迪臣太守論述浙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飲冰室合集·文集》，卷3，頁2。

<sup>11</sup> 梁啟超：〈與林迪臣太守論述浙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飲冰室合集·文集》，卷3，頁3。

<sup>12</sup> 梁啟超：〈湖南時務學堂學約〉，《飲冰室合集·文集》，卷2，頁23-29。

<sup>13</sup> 梁啟超：〈論教育當定宗旨〉，《飲冰室合集·文集》，卷10，頁53。

<sup>14</sup> 梁啟超：〈論教育當定宗旨〉，《飲冰室合集·文集》，卷10，頁55。

<sup>15</sup> 梁啟超：〈教育次序議第一·教育政策私議〉，《飲冰室合集·文集》，卷9，頁33。

為循序漸進才是培養人才的正確順序，甚至羅列出青少年各個年級的各種認知能力，以科學的列表闡述小學義務教育的必要性，這也是普及國民教育的必經階段。

### （三）創作《王荊公》的原因

在《王荊公》的自序裏，梁啟超表明：其實很早就想寫王安石的傳記，但因為政局或瑣事雜多等原因而擱筆，現在有機會重新整理所有相關古籍，才更加理解荊公的智慧，所以才有「謂能知荊公能尊荊公者，無以異於酌潢潦之水而以為知海，睹甕牖之明而以為知天也」的評語。<sup>16</sup>關於《王荊公》寫作動機的多種猜想，梁坦言，只是為了「示偉人之模範」，而非「為過去歷史翻一場公案」。但學界根據對梁啟超流亡日本的書信和相關文獻的研究，認為「示偉人之模範」只是梁撰寫此書名義上的美化，真正的原因則是梁啟超希望自己早日「謀開黨禁，歸國主政」。除此之外，清華大學蔡樂蘇等人通過對比梁啟超和嚴復對王荊公的評價，認為梁的《王荊公》問世，還有一個被大家經常忽視的經濟原因——賣文解困。<sup>17</sup>

1908年梁寫《王荊公》一書，「主旨在發揮王荊公的政術，所以對於王氏所創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討論極詳」，<sup>18</sup>其中包括對荊公教育選舉方面的解讀，尤其是興辦學堂的決策，讚賞之情溢於言表。關於此書的內容文獻來源，鄧廣銘在1997年曾考證「《王荊公》全是從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脫化而來，既未作新的考索，自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意見」，<sup>19</sup>這更能解釋全書將重點放在王荊公政術學術的構思，以及《王荊公》被梁稱為「洗冤錄」的原因。但梁對此的回應是「屬稿時所資之參考書不下百種，其取材最富者為金溪蔡元鳳先生之《王荊公年譜》」。<sup>20</sup>如此一來，孰是孰非，令人玩味。至於王荊公對梁啟超的影響，有研究直接斷定，王安石的教育改革精神，激勵了康梁開展的維新運動。<sup>21</sup>筆者認為，這種判斷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從梁啟超的個人傳記，可查考梁確實對王的變法精神十分欣賞，而梁啟超寫此書，更多的是借助荊公表達自己的心意，希望能重新回國效力，實現發展教育，推廣學校的宏願。

## 三、教育改革家王安石

千年科舉制度，始於唐，盛於宋。宋朝有三次興學運動，其中持續時間最久，發展最為迅速，影響最大的，就是由王安石在熙寧元豐年間主持的第二次興學。在宋神宗（趙頊，1048-1085，1067-1085在位）的支持下，王安石才得以將自己的各種改革政策，推行

<sup>16</sup> 梁啟超：〈王荊公〉，《飲冰室合集·專集》，卷27，〈自序〉至頁8。

<sup>17</sup> 蔡樂蘇、劉超：〈政術·心術·學術——梁啟超、嚴復評王安石之歧異探微〉，《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0卷3期（2010年5月），頁180-191。

<sup>18</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483。

<sup>19</sup> 鄧廣銘：〈序言〉，《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5。

<sup>20</sup> 梁啟超：〈王荊公〉，《飲冰室合集·專集》，卷27，〈例言〉。

<sup>21</sup> 羅傳奇、吳雲生：《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頁259-261。

到現實中實行，其中尤其看重教育。王安石曾言，「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sup>22</sup>由此可知，在荊公的心中，教育對一個國家的未來建設是極為重要的。

## （一）王安石教育改革的初衷

### 1. 貢舉改革的呼籲之聲

貢舉制度自唐以來，以德行為本，推崇儒家學說，後慢慢演變開始注重詩賦文辭，且其地位越來越高。到了北宋時期，在第一次興學的影響下，士大夫們產生改革貢舉制度的想法，例如，當司馬光（1019-1086）得知神宗皇帝有意改革貢舉，承認並支持這一做法，甚至稱頌皇帝聖斷「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群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sup>23</sup>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罷掉詩賦，用「講求天下正理」來說服神宗，謂：

經術者所以經世務，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所賴焉？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政務爾！<sup>24</sup>

這段話說明兩個要點：第一，王安石最初的變法首要目標就是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第二，當前科舉選拔出來的儒者，很少專修經術，可見當前科舉制度中，經術的被重視程度不高。再看仁宗（趙禎，1010-1063，1022-1063 在位）皇帝在位時，王安石就貢舉改革撰寫的萬言書，就更能理解他的教育改革思想。

### 2. 從〈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看王安石的最初教育改革思想

嘉佑三年（1058），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陳明：當下朝廷最大憂患，即「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或科舉選拔，或「閭巷草野」之間，人才皆匱乏，解決此難題的關鍵在於「教」和「任」。如何教，由誰去任？王安石曾說「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sup>25</sup>主張派遣能力強的教官去教授與治理國家相關的內容。選拔人才之後的任用是最終目的，依據每人的才能以及特展，安排在適合的位置，以人盡其才。

王安石把「教」提到一個很高的位置，而「教導之官」更是重中之重。王認為，課上一味注重「講說章句」，學生必須「死記硬背」才能合格，即使真的培養出人才，也不過

<sup>22</sup> （宋）王安石：〈慈溪縣學記〉，《臨川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83，頁 870。

<sup>23</sup> （宋）司馬光：〈議學校貢舉狀〉，《溫國文正司馬公集·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65），卷 39，頁 300。

<sup>24</sup> 〈王安石事蹟上〉，（宋）楊仲良編：《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第 4 冊，卷 59，頁 1915。

<sup>25</sup> （宋）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 39，頁 412。

是「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sup>26</sup>由此可知，人才培養最核心之處其實是對教官的培養。換到現代的說法，其實就是對師範教育的重視，而王安石在一千多年前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不得不說他的教育觀念還是具有超前預見性的。

除了「學」和「教」，王安石還支持對專才的培養。每個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技巧，讀書人也一樣。既然精力有限，諸子百家之學體系龐大，全部學習，固然可大略知道其中內涵，但專業不精，現狀只停留在「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sup>27</sup>真正為官需要用到這些知識的時候，反而沒學好。

## （二）王安石科舉考試內容的改革

### 1. 《乞改科條制》

熙寧二年（1069），呂公著（1018-1089）、蘇軾（1037-1101）等人上書反對王安石罷詩賦的提議，神宗對變法的態度動搖，王安石上書〈乞改科條制〉，出於維護「一道德」的目的壓倒眾人非議，其建議也被神宗採納。首先，他明確提出學校培養人才的重要性，曰「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sup>28</sup>其實早在宋朝以前，歷朝歷代大都是通過學校培養人才，但在宋初的這一習慣發生了改變，科舉考試的地位被抬高了許多，對學校重視度反而不高。於此，王安石提出復古，以學校養士，這不但可以保障考生的品德教育，而且能培養出經世致用之人才。其次，經義取士代替詩賦取士。王安石認為當前如要效法古制，就「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sup>29</sup>若此，三代人的過渡，便能實現古制。再次，廢止諸科，明經並進士。明經進士合併，充分的表現出王安石看重經義，培養經世致用人才的教育思想。最後是關於派遣教授往地方任教的問題。王安石提出西北五路對策，即「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並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sup>30</sup>這項對策對南北考生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效地減少了區域的不平衡性。

### 2. 改革的具體內容

朝廷群臣討論的結果，是神宗皇帝採納了王安石的建議，改革了科舉考試的內容，即：

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

<sup>26</sup> (宋)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39，頁414。

<sup>27</sup> (宋)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39，頁415。

<sup>28</sup> (宋)王安石：〈乞改科條制〉，《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31，頁363。

<sup>29</sup> (宋)王安石：〈乞改科條制〉，《王文公文集》，卷31，頁363。

<sup>30</sup> (宋)王安石：〈乞改科條制〉，《王文公文集》，卷31，頁363。

〈（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乃得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為一號考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法。<sup>31</sup>

簡而言之，就是罷黜了詩賦帖經墨義的考試形式，以經義考試為主，增加進士名額，並建立新科明法作為過渡期。

關於太學課程，除了規章制度的改革，學生在太學的學習內容上也是大有不同。自慶曆四年（1044），太學遷出國子監，經學始終是重點課程，在解釋章句的層面之外，教員還會把經書內容和實際政事聯繫起來，這樣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將來為國效力時，銜接的更恰當。熙寧四年（1071），太學在王安石的強烈建議下，實施三舍法。太學課程仍然以經書為主，兼修習策論，詩賦課程取消並添置律學課程。這也是和王安石的學校貢舉制度變法相通。值得注意的是，原來五經中的《春秋》被取消，而《周禮》倍受重視。梁庚堯分析其原因，認為《春秋》太難懂，《周禮》則是王安石推行新政的理論依據，<sup>32</sup>雖然各種資料表明當時的學生幾乎都不學歷史，但王安石並沒有禁止學生修習歷史，可視為學生的自主選擇。據《宋史·選舉志》記載，不但細化了進士科的考試內容、考試模式等有所改革，而且學校的規模更是「設遍天下」，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sup>33</sup>

### （三）從《三經新義》看王安石

傳統的治經方法是謹守注疏，講章說句。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上書要求，新制進士對大義<sup>34</sup>「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sup>35</sup>因此，不但考試標準發生了變化，而且考官的考核標準也不盡相同，讓考生無所是從。熙寧五年（1072）正月，王安石提出奏請，神宗批復道：「經術，今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頒行，令學者定於一。」<sup>36</sup>熙寧六年（1073）三月庚戌，神宗皇帝下令設置經義局，命王安石及呂慧卿（1032-1111）、王雱（1044-1076）等人一同修撰、編著《詩》、《書》、《周禮》，眾人遂合力編著《三經新義》，作為學校的基本教材。據史書記載，《三經新義》由三本書組成，《周禮儀》22卷，《詩義》20卷，《書義》13卷，它們分別是對《周官》、《詩經》和《尚書》的重新釋義。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周禮》出自王安石之手，詩書則出自其子王

<sup>31</sup>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55〈選舉一科目上〉，頁1714。

<sup>32</sup>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66。

<sup>33</sup> （元）脫脫：《宋史》，卷155〈選舉一科目上〉，頁1707。

<sup>34</sup> 在慶曆嘉佑時代，經義又稱為「大義」。

<sup>35</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1995），第16冊，卷220，頁5334。

<sup>36</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7冊，卷229，頁5570。

雋及呂慧卿、呂升卿等門人之手。熙寧八年（1075）六月，三書之新義完成，史書記載，神宗對此十分支持，表示「今談經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經義，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sup>37</sup>而後開始推行，並稱之為《三經新義》。《三經新義》頒佈後，就一切主新說，廢諸儒之論，變帖經為墨義，結束漢儒的「章句注疏之學」，開創宋儒的「性命義理之學」的先河，甚至借助行政力量通過訓釋經義——以經術造士——變帖經為墨義，擴大了「性命義理」之學，而排擠了「章句傳注」之學。<sup>38</sup>

《周官新義》的提要中，王安石自述用意：「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為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可行」，<sup>39</sup>只是想用新義來堵住眾儒之口，試圖用「新義」來改變「俗學久矣」的局面，並為自己的新政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其在晚年，依然孜孜不倦的編著《字說》，一直到神宗元豐五年（1082），王安石進《字說》24卷。從《字說》的內容及其思想性來看，是一部法家思想內容的書。<sup>40</sup>後元祐年間（1086-1094）恢復詩賦，經學課程也添置了很多經書，在注疏方面，朝廷當局恢復舊的注疏，雖停止《字說》的使用，但也並沒有禁止學習王安石的新解，<sup>41</sup>新義沒有被禁止，從側面也說明《字說》還是有一定可取之處。

陳師道（1053-1101）曾言，「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sup>42</sup>王安石推行《三經新義》，考生背誦其中章句，而並沒有在章句的潛在意思上下功夫，可惜《三經新義》的原稿已經找不到，新義是否精益求精也無從判斷。拋開政治等因素，近人程元敏撰寫的《三經新義輯考匯評》，書中收錄諸家對王氏新義各種評價，其中對王氏新義的批評集中在「穿鑿附會，以文害義」、「陋學壞風俗」和「誤用壞國」的幾點問題上。但在其自序言明「宋人治經，敢變漢唐舊義，創立新說，於時最早，而又影響官學及私學著述最大者，莫加於王安石三經新義者。」<sup>43</sup>王安石的這種自創經義，不被歷代注疏所限制，精求義理的治學態度還是值得學者稱頌和學習。雖然陳後山的評價如此，也不可否認王氏新義的獨特性，梁啟超先生也評價其為「以此道治經者，創於先漢之董江都劉中壘，而光大之者荊公也。」<sup>44</sup>

<sup>37</sup>（明）陳邦彥：〈學校科舉之制〉，《宋史紀事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38，頁106。

<sup>38</sup>馬振鐸：《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學思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頁261-267。

<sup>39</sup>（宋）王安石：〈序〉，《周官義疏（附考工記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2。

<sup>40</sup>鄧廣銘：《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206。

<sup>41</sup>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頁67。

<sup>42</sup>（宋）陳師道：《後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1，頁690。

<sup>43</sup>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匯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上冊，〈自序〉，頁1。

<sup>44</sup>梁啟超：〈王荊公〉，《飲冰室合集·專集》，卷27，頁188。



## 四、關於王安石教育改革的爭論

### (一) 對王安石教育思想理論的質疑

#### 1. 對「道德性命論」的質疑

宋英宗（趙曙，1032-1067，1063-1067 在位）治平年間（1064-1067），王安石謂：「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sup>45</sup>王認為，經書並不是真正穩固人心的秘訣，如果皇帝能夠擔任老師的角色，並用使人信服的道德來約束規範人心，教育士人，即使經書被毀滅，人心也是永遠不滅。王安石為了極力促成其新義的頒佈，試圖用「道德性命論」來解答百官對新義的質疑。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則直接批評其「道德性命論」。司馬光認為，如果「道德性命論」真的在學校或士人之間風行，勢必會帶來很多消極的負面影響，「今之舉人，發言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sup>46</sup>用這些虛空且脫離現實的言論，來迎合考官，贏取功名利祿，高官厚位，這種心態極具功利性，根本就和王安石最初提出的「心學」相背離，即使考試中文章寫得出眾，仍然免不了消極虛空。蘇軾在〈議學校貢舉狀〉一文中的看法和司馬光的接近，認為「性命說」的推行，最後必然走向老莊虛靜空無的脫離現實層面，這對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是極為相背離的，所以他上奏皇帝，希望以「實學」為主，「博通經術」，腳踏實地，這樣做雖然耗費很多時間精力，但長遠來看，也是十分值得。<sup>47</sup>

從上述幾個有代表性的反對者言論來看，反對王安石的「道德性命論」主要是出於對「虛無空談」的抵制，認為其後果是十分嚴重的。也有學者表示，推行「道德性命論」失敗的原因是，王安石的後繼者出於各種私利，拉幫結派，排除異己，在學校推行《三經新義》和《字說》，並印刷發行王安石所注解的《老》、《莊》及佛經，直接控制了科舉考試，但他們對王安石變法的初衷，並沒有任何興趣和發揚，最終導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元祐初年，舊黨執政，王氏新學立刻就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侍御史劉摯（1030-1098）上奏要求嚴禁「道德性命說」，並在〈論取士並乞復賢良科疏〉中，稱其為「以陰陽性命為之說」、「汜濫荒誕為之辭」，「虛空妄談」，應該被放在「所棄之列」。<sup>48</sup>

#### 2. 對「一道德」「一元化」的質疑

在教育改革方面，王安石推行的最直接政策，即用經義取士，興建學校，推崇義理並統一思想。他曾道，大宋人才匱乏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學術不一，所以才導致「一人一義，

<sup>45</sup> （宋）王安石：〈虔州學記〉，《臨川先生文集》，卷 83，頁 859。

<sup>46</sup> （宋）司馬光：〈論風俗箴子〉，《溫國文正司馬公集·文集》，卷 45，頁 352。

<sup>47</sup> （宋）蘇軾：〈議學校貢舉狀〉，《蘇東坡全集》（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6），下冊，〈奏議集〉，卷 1，頁 399。

<sup>48</sup> （宋）劉摯：〈論取士並乞復賢良科疏〉，《忠肅集（附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4，頁 58-60。

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sup>49</sup>王安石所實施的新政，重點在罷黜詩賦，看重經義，政敵司馬光也同意這種做法，但在「一道德，同風俗」的問題上，司馬光卻持質疑態度。元祐元年（1068），司馬光在〈起請科場箚子〉<sup>50</sup>中指出，限制考生的思想，推行新義，直接的後果是否定百家之言，這樣的儒學已不是最初的聖人之道。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在〈南安軍學記〉中，對王安石「一元化」模式也提出反對。原因很明確，即「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sup>51</sup>

此處筆者認同朱剛的研究，即學校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具有發表異議的功能和權力。<sup>52</sup>蘇軾認為王安石忽略了最關鍵的一點：「士」的作用終究要服從於「王政」，且「士」的功能也僅限於「取士論政」的「論」字上。如果學校和王政之間的聯繫過於密切，就可能招來黨禍之爭，而不能專心發展學術思想。蘇軾的解說也是針對王安石在〈虔州學記〉中對《尚書·益稷》篇的有意誤讀所展開的批判。兩人討論的主體同樣是「士」，但對於學校的位置和「士」與「政」的關係，意見卻截然不同。蘇軾提倡、支持學校應具有「多元化」的包容性，而王安石卻把學校視為培養士人並服務政治的「一元化」統一思想的工具或手段。<sup>53</sup>

## （二）對王安石改革內容方面的各種矛盾分析

### 1. 學校教育與科舉取士的矛盾

神宗登基後，熙寧四年，王安石在〈乞改科條制〉中提出諸多教育改革方面的具體措施，於是神宗召集眾大臣來共同商討辦學和科舉的問題，即〈議學校貢舉狀〉。目前留下來的奏狀除了蘇軾，還有蘇頌（1020-1101）、司馬光、程頤（1033-1107）、劉攽（1023-1089），呂公著<sup>54</sup>等人。除了蘇軾等少數人持反對意見外，大多數人都支持王安石興辦學校改革科舉取士的提議。

在支持派中，作為王安石在朝廷中最大政敵的司馬光，其意見值得討論。熙寧二年（1069），司馬光在〈議學校貢舉狀〉<sup>55</sup>中列出當下辦學相關的弊病，他認可學校培養人才，但目前學校管理的細節積弊，才是他想要改善，例如拿朝廷辦學公費，不做實事，徇私舞弊；教員任用的不稱職等。這些學校辦學的弊病，和王安石的看法可謂不謀而合。而在持質疑態度的少數大臣中，蘇軾的意見最具代表性。蘇言，求得人才的方法在於要「知人」，而要想做到「知人」，就要懂得「責實」，注重實際才好。正確的時機推行適合的政策才能看到成效，就當今的貢舉新制來說，取消掉科舉利用學校直接推薦培養人才，對

<sup>49</sup>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31〈選舉四〉，頁293。

<sup>50</sup> （元）脫脫：《宋史》，卷155〈選舉一科目上〉，頁1715。

<sup>51</sup> （宋）蘇軾：〈南安軍學記〉，《蘇東坡全集》，上冊，〈後集〉，卷15，頁623-624。

<sup>52</sup> 朱剛：〈士大夫文化的兩種模式：《虔州學記》與《南安軍學記》〉，載氏著：《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頁174-180。

<sup>53</sup> 朱剛：〈士大夫文化的兩種模式：《虔州學記》與《南安軍學記》〉，頁174-180。

<sup>54</sup> 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頁177。

<sup>55</sup> （宋）司馬光：〈議學校貢舉狀〉，《溫國文正司馬公集·文集》，卷39，頁299-308。

大宋的選拔人才制度突然改變，勢必會導致國家混亂。蘇軾提議，保持當下學校的規模，以不變應萬變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千年之後的清末，科舉取士或學校取士，意見不一。梁啟超贊成學校取士，並坦言支持王安石學校取士的提議，且大膽揣度荊公的本意。梁認為，雖然科舉制度沒有直接被學校機制取而代，但是荊公的內心始終主張廢科舉。甚至，梁認為荊公是有意擴大學校的規模，但我們從宋朝遺留下來的各種書籍資料，還未能找出證據證明王安石沒有大力興建小學的想法，所以不能因此排除荊公沒有興辦小學的主意。

## 2. 德行取士與考試取士的矛盾

針對改革，王安石建議神宗可以通過學校標準考核的方式來保證考生的言行品德。如上，蘇軾的意見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蘇曾向神宗皇帝進言：「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sup>56</sup>蘇軾認為，一個人的道德修養是不能簡單的從科目考試中來確定，需要長時間的觀察接觸，才能瞭解。如果非要設立科目來決定考生品行的優劣，最後的結果只能是作偽。考生為了迎合考官或皇帝的要求，也有可能偽裝成品德高潔的表現。

司馬光在元祐元年（1086）也曾多次上書提議，通過保舉連坐的懲罰方式來規範約束考生的德行，也印證了蘇軾早前的預言——通過科目考試來判斷考生德行的不現實性。同時，據梁庚堯的研究，唐代就有經明行修科，但屬於制舉，此時司馬光的奏議，意在把此科目放在和進士相同的常科地位，<sup>57</sup>其結果也證實了蘇軾「教天下相率而為偽」<sup>58</sup>的另類極端後果。

## 3. 經義取士和詩賦取士的矛盾

宋代選拔人才的標準「不是根據個人品質所學要的德和才，而是根據為評價個人品質所不需要的、寫作論說文和詩賦的文字技巧。」<sup>59</sup>宋初以詩賦為主，其中賦所佔的比例很大，兩者都屬於韻文，講究寫作規範和押韻。正因如此，考生須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韻文寫作技巧。與韻文相對應的古文，則是一種便於敘事和說理的文體，承擔着「文以載道」的重大使命。梁庚堯認為，受到重視的經義考試，正是由於古文的應用，才能取代帖經和墨義，成為科舉中經籍考試的主流。<sup>60</sup>科舉考試的詩賦科目主要考察學生寫作詩賦的能力，而經義科則考察學生對於本經和《論語》、《孟子》的把握。<sup>61</sup>至於策論考試，憑藉實用性，在殿試中的優勢更加明顯，而古文則是策論的主要敘述文體。范仲淹的慶曆改

<sup>56</sup> (元)脫脫：《宋史》，卷155〈選舉一科目上〉，頁1714。

<sup>57</sup>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20。

<sup>58</sup> (宋)蘇軾：〈議學校貢舉狀〉，《蘇東坡全集下》，下冊，〈奏議集〉，卷1，頁398。

<sup>59</sup> [美]賈志揚(John W. Chaffee)《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72。

<sup>60</sup>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頁20。

<sup>61</sup> Hilde 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ss.: 2007), p. 55.

革，策論更是取代了詩賦。雖然改革的時間短暫，但為後期的興學運動帶來了啟發式的影響。

在〈議學校貢舉狀〉的群臣討論上，對於改革科舉考試內容，眾說紛紜。贊成派如呂公著，司馬光，韓維等，而反對派中依然是蘇軾。蘇謂：「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sup>62</sup>從在這一層面來說，取消不取消詩賦，對於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能不能為朝廷效力，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而王安石則竭力促成經義取士，在於經義取士有兩大最實際的用途，第一即培養經世致用之材；第二就是可以更好的統一思想，實現「一道德」，這對於維護封建統治是十分關鍵的。即使如此，祝尚書通過流傳下來的宋人經義的數量判斷，前人後人都不看重經義；並通過對當時少量經義篇章的研究，判定經義的三大流弊：不讀原著，專事穿鑿；剽竊舊作，全用套類；以及拘於形式，流於對偶。<sup>63</sup>這些弊端，和王安石改革的初衷還是有所違背的。或許正因為此，王安石晚年罷官回鄉，才悔悟「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sup>64</sup>

綜上所述，那場關於學校貢舉的近臣討論會，主要有三種觀點，<sup>65</sup>一種即以司馬光、呂公著等人的廢詩賦專經義派；第二種則是承認詩賦取士的缺陷但希望通過改良的中間派，以蘇頌為代表；最後一種則是支持肯定詩賦取士的不可替代位置，以蘇軾為首。三種觀點交織，政策也是反復更改。「詩賦論」和「經義論」長期困擾着北宋科舉直到不得已時，才採取折中調和的辦法，走出了一條較為寬闊的路，即「兼收」和分立。<sup>66</sup>

## 五、王安石與梁啟超的教育改革

王安石和梁啟超相隔千年，但在教育改革、振興國家等方面也有很多共鳴的地方，例如兩人都提倡廢科舉興學校，也都支持擴展諸科，培養經世致用之才。王安石細化分類其他學科，培養專業人才的做法，也令梁啟超極為欣賞。

再者，重師範重教育，發展諸科而非專科等做法，是為了培養出經世致用的人才，以達到振興國家的目的。由此聯想到現代教育，中學修習各種科目，培養學生的各方面能力，步入大學後開始選修專業來精修，達到培養專才的目的。這樣培養的人才，可以更好的融入社會，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雖然古代的經義或詩賦的科舉考試已然不在，但高考同樣擔當着選拔人才的作用，學校也可以通過保送的方式讓優秀的學生直接免去高考，可謂綜合古代的科舉和學校雙層作用。

<sup>62</sup> (元)脫脫：《宋史》，卷155〈選舉一科目上〉，頁1714。

<sup>63</sup>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344-349。

<sup>64</sup>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經義論策》，《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16，頁938。

<sup>65</sup> [日]近藤一成著，魏常海、張希清譯：〈王安石的科舉改革〉，載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136-166。

<sup>66</sup>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頁52。

## 六、結論

王安石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對於現代教育也是有指導意義的。好的改革應該建立在多次試驗的基礎之上，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再進一步大範圍推廣。王安石只通過自己在個別地方的任官經歷，以及在當地推行政策成功的少數案例，就在全國推行新策，實有些以偏概全。因此，「合變時節」的形勢教育以及「適時而變」教育改革精神，<sup>67</sup>是值得我們現代教育學習的。

---

<sup>67</sup> 張雷：〈王安石的變法教育及現代價值〉（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頁5、15。

